

文化与抗战

郭沫若与 中国知识分子 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 文化选择

中国郭沫若研究会 编
郭沫若纪念馆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郭沫若

文化与抗战

——郭沫若与中国知识分子
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文化选择

中国郭沫若研究会 编
郭沫若纪念馆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与抗战:郭沫若与中国知识分子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文化选择/中国郭沫若研究会,郭沫若纪念馆编.
成都:巴蜀书社,2006.7

ISBN 7-80659-865-0

I. 文... II. ①中... ②郭... III. ①郭沫若(1892~1978)—人物研究②知识分子—研究—中国—近代
IV. ①K825.6②D66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63232 号

文化与抗战

——郭沫若与中国知识分子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文化选择

中国郭沫若研究会 郭沫若纪念馆 编

责任编辑	李 蓓 谢正强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028)86259397
网 址	www.bsbook.com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028)86259422 86259423
经 销	新华书店
照 排	成都华宇电子制印有限公司
印 刷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6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210mm×148mm
印 张	12.125
字 数	300 千字
书 号	ISBN 7-80659-865-0/K·143
定 价	26.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

目 录

“革命文化的班头”：抗战赋予郭沫若的历史角色

..... 蔡 震 (1)

抗战时期文人郭沫若的政治抉择 贾振勇 (15)

从中国抗战文化研究看郭沫若研究的新思路 李 怡 (34)

从《十批判书》看郭沫若在抗战时期的政治文化选择

..... 徐鹏绪 (44)

论郭沫若文化身份的嬗变

——从《女神》到《屈原》 魏红珊 (63)

略论抗战时期郭沫若对以儒家文化为中心的传统文化

的再选择 罗佳明 (80)

从审美解读到民族精神的建构

——郭沫若对儒家文化的阐释 陈晓春 (90)

郭沫若文化抗战的历史评价 杨胜宽 (107)

浅议郭沫若与中国知识分子在民族解放战争中文化选

择的问题 秦 川 (121)

“文艺的民族形式论争”的结束 (韩国) 金惠俊 (130)

“暴露与讽刺”论争中的郭沫若和茅盾 (韩国) 白永吉 (147)

- 郭沫若抗战时期的五彩人生 税海模 (163)
- 大醇小疵郭沫若 (提纲)
- 解读郭沫若的人生选择 谭继和 祁和晖 (177)
- “便是阅墙的兄弟应该外御其侮的”
- 略谈郭沫若 1936 年的三件事 廖久明 (182)
- 民族解放战争语境中的郭沫若历史剧创作 周海波 (192)
- 民间与民族：中国现代戏剧的文化选择 胡志毅 (211)
- 论抗战时期郭沫若历史剧的情感因素 宋嘉扬 (227)
- 论郭沫若抗战诗歌及所谱抗战歌曲之艺术风格 郭云翔 (239)
- 抗战时期西迁乐山的武汉大学教授群体的文化选择
- 兼论郭沫若抗战时期的文化选择 陈 俐 (251)
- 《黄河》与西北国统区抗战文学 卢洪涛 (267)
- 编《〈甲申三百年祭〉风雨六十年》随想 王锦厚 (274)
- 抗战时期韩中文学思潮比较 (提纲) (韩国) 高慧琳 (287)
- “日支人民战线”谍报网的破获与日本警方对郭沫若
- 监视的史实 (日本) 武继平 (292)
- 市川事件中的平田 勳 (日本) 齐藤孝治 (314)
- 长谷川照子与郭沫若先生
- 暨日本研究长谷川照子现状及寻访
- 其故居 (日本) 坂井尚美 (320)
- 《创造周报》与郭沫若文坛地位的确立 魏 建 张 勇 (328)
- 试论郭沫若的民族主义思想：从“五四”谈起
- (美国) 陈小明 (342)

郭沫若浪漫诗学的三张面孔	肖伟胜 (349)
论郭沫若的“天才情结”	刘悦坦 (364)
会议综述	谢保成 (376)
编后记	(382)

“革命文化的班头”： 抗战赋予郭沫若的历史角色

蔡 震

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上，没有哪一次战争像抗日战争那样深刻而久远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的命运；也没有哪一次历史事件像全民抗战那样广泛地激发了民众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高扬起民族自强的英雄主义气概。在这样一个宏阔的历史场景中，自然涌现出了许许多多叱咤风云的人物，郭沫若即是其中之一。

郭沫若不是运筹帷幄的将领，也不是血战沙场的军士，他驰骋于抗战文化领域，在组织抗战宣传工作和推动文化统一战线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他个人的人生道路也因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

回顾一下郭沫若走过的人生旅程，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后半生走了一条亦文亦政的道路。这为他生前带来了巨大的声誉，也为他身后带来了许多非议。这成了一个任人评说的课题。但是，如果不了解郭

沫若是怎样走上了这样的人生行旅，也就是说不去解读那一段历史过程，那么这样那样的评说，就难保不演绎为当代的误读。

郭沫若后半生所走的亦文亦政的道路，应该说是始于抗战时期。尽管他在1926年前后的北伐时期曾经投笔从戎，与政治开始了最初的结缘，但那之中不乏浪漫诗人与书生意气的孟浪、冲动。大革命失败后，被国民党当局通缉而不得不流亡日本的郭沫若，沉潜于书斋十年之久，在中国古代社会、金文甲骨的研究中成就了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辉煌。如果不是战争爆发，他可能会沿着这样的人生之路走下去，那样，我们看到的就是另一个郭沫若。也就是说，抗战时期郭沫若所经历的人生场景的转换，首先是有一个时代动因的驱遣。

中国的抗战，是在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这样一种政治组合的基础之上进行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原本分别代表着中国社会中对立于两极的不同阶级的利益，他们实际上也代表着中国命运的不同历史走向。但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国共两党再度合作。正是在这一政治组合的态势下，全中国上下不分党派，不分民族，不分社会阶层，建立起一个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文化统一战线则是其重要的一翼。

如同领军打仗，文化统一战线也需要一个领军的群体。历史的进展表明，在文化领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酝酿、形成的过程中，国共两党都很快就将郭沫若锁定在其各自的政治视野之内，作为这一领军群体最主要，也是最合适的人选。显然，郭沫若此前的人生经历决定了这一点。

在“五四”时期，郭沫若创作的《女神》，成为现代文坛新诗运动的奠基之作。与此同时，以他为中坚的创造社，则代表着新文学浪漫主义运动的黎明期。随后，在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和左翼文化运动中，郭沫若既是大力倡导者，也是身体力行的努力实践者。流亡日本期间，他在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和古文字的学术研究中，取得了令学术

界瞩目的开拓性成果。所有这一切，使郭沫若在新文化领域成为一个具有广泛影响力的重量级人物。

另一方面，郭沫若 1926 年投笔从戎参加北伐，又使他拥有了当时像他这样的文化风云人物所少有的政治经历。从北伐到大革命失败这一期间，郭沫若担任了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蒋介石的总司令行营政治部主任，并写出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最早公开揭露了蒋介石背叛革命的真面目，因而被国民党开除党籍并予以通缉。在南昌起义中，郭沫若被任命为起义军总政治部主任，在起义部队南下的征途上，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样的政治经历，无疑使他在中国的政坛上也是一个被关注的对象，即便他长时间流亡在海外。

事实正是如此。

1935 年，中国工农红军尚在长征途中，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中共代表团根据大会确立的方针，讨论通过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并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委员会名义发表，提出“抗日救国”的纲领。同年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举行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毛泽东发表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在这样的政治形势下，国统区的进步文艺界开始了关于“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当时在日本东京的左联盟员，把《八一宣言》带给郭沫若看，向他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文化统一战线政策，并请他就“国防文学”撰写文章。本来对于“国防”这样的提法持有异议的郭沫若，一俟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后，便在两个口号的论争中撰写了一系列文章，阐述了精辟的意见，以他在文学界的影响力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在两个口号的论争中，左翼文化阵营出现了一些宗派主义、左的倾向，为了消除无谓的争执，弥合分歧，地下党文委负责人潘汉年特别致信郭沫

若，信中写道：国内文化界“宗派与左稚倾向依然严重，我们有许多意见，要你、茅盾、鲁迅三人共同签名发表一个意见书公开于文化界——内容侧重文学运动，与你所写反对卖国文学的联合战线诸论点差不多，已由茅盾兄起草”。潘汉年请郭沫若，如觉有“未尽善尽美之处”，“另文补充，发挥”。他还建议郭沫若，对于那些青年朋友“闹意气，包办、自负的纠纷，能够适当地给他们一个纠正”。茅盾也为此次致信郭沫若，并将起草的《宣言》寄给郭沫若征询意见。这份《宣言》就是1936年10月发表的，由鲁迅、郭沫若、茅盾牵头，包括包笑天、林语堂、周瘦鹃等文艺界各方面代表人士21人联合署名的《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①。《宣言》呼吁：“全国文学界同人应不分新旧派别，为抗日救国而联合。”它标志着在抗日救亡的原则下，文艺界各个派别消除了分歧，取得了共识，初步形成了统一战线的局面。

在国民党方面，1936年12月发生的“西安事变”，促使蒋介石把统一战线问题真正放到了国民党的国是政策考虑之中。“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两个月后，一度以休养为名回到奉化的蒋介石重返南京参加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在这期间，他指示行政院准备在庐山召开一次国事座谈会，在行政院秘书处拟定的出席会议邀请名单上出现了尚被当局通缉的郭沫若的名字。蒋介石看到名单上郭沫若的名字时说道：“啊，好得很，我对此人总是十分清楚的。”他还特别向行政院总务处长何廉（郭沫若后来秘密回到上海时，官方去接船者即是他）询问了郭沫若的情况^②。“牯岭国事会议”在7月中旬召开，会议的主题是讨论统一战线问题，身在日本的郭沫若当然未能与会，所以这一历史细节也从未被人们注意到。但是，蒋介石国民党当局的这样一

^① 据郭沫若纪念馆馆藏资料。

^② 见《何廉回忆录》，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

个政治姿态（即便带有政治作秀的成分），起码表明，郭沫若成为其统一战线政策考虑中的一个因素，而且，这也在实际上解除了悬在郭沫若头上十年之久的通缉令，郭沫若秘密归国的行动，正是在这样的政治形势之下才得以操作成功的。

1937年7月底，郭沫若别妇抛雏秘密归国。甫到上海，即开始从事抗战文化宣传工作，并与夏衍等人创办了以国共合作为背景的《救亡日报》，并任社长。9月，蒋介石特意在南京接见了郭沫若，希望他留在南京，并表示要给他一个“相当职务”。郭沫若作为中共党员，在流亡日本期间中断了的组织关系很快得到了恢复。当国共合作在国民政府组织机构层面的一个主要机构，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建立的时候，无论对于国民党还是共产党而言，郭沫若都是政治部负责文化宣传工作的第三厅厅长的不二人选。国民党人是希望借助郭沫若的声望延揽文化界各方人士；周恩来则说，有郭沫若当这个厅长，他任政治部副部长才是有实际意义的。

三厅和后来的文化工作委员会（郭沫若任主任），几乎集中了国统区全部的文化精英。三厅在抗战文化宣传和文化统一战线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三厅的工作又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指导下开展的。郭沫若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

二

抗战是个需要英雄的时代，也是造就英雄的时代。历史就是以这样的方式选择了郭沫若，或者说时代为郭沫若提供了这样一个弄潮的机遇，使他得以在抗战文化领域尽展才情，叱咤风云。

但是从个人方面来说，郭沫若不是不可以选择其他的生存方式，譬如继续做一个专注于历史研究的学者。在他刚回到国内的时候，沈尹默给他的建议就是去作学问，蒋介石在南京见他时，也有过这样的

建议。他在抗战期间撰写的《十批判书》、《屈原研究》等学术著作，对于先秦思想史进行了系统的研究。郭沫若也不是不能以其他的生存方式奉献他的一份爱国主义情怀，譬如专注于文学创作。他在重庆期间创作的《棠棣之花》、《屈原》、《虎符》等六部大型历史剧，以古事鉴今事，高扬爱国主义精神，鲜明地表达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主张，激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它们足以在抗战文化史中留下光彩夺目的一页。

学术研究、文学创作，郭沫若在抗战期间都没有放弃，而且均有不凡的建树。但他首先还是接受了时代对于他的选择，接受了一个关乎政治的挑战，去担当一个文化“班头”的社会角色。郭沫若的精神个性在其中显示了一种特别的意义。也就是说，在历史的动因之外，其行事的背后还存在着一个相应的个人动机。应该说，是时代与个人的双向选择，决定了郭沫若在抗战期间及其以后所走的人生道路。当然，郭沫若做出这样的个人选择，也不是一念之间、一蹴而就的决定。

事实上，在归国之前和归国之初的一个短暂时期内，郭沫若对于自己在结束政治流亡后应该选择一种什么样的生存方式，对于自己的人生是不是应该再一次与政治结缘，是有所游移的，是怀着一种矛盾的心情的。1935年，郭沫若写过一首题画诗，诗中有句云：“独对苍山看不厌，渊深默默走惊雷。”（稍后改作“独对寒山转苍翠”）^①从中我们不难看到，在世人眼中，正沉潜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的学者郭沫若，其内心翻涌着怎样一种不甘寂寞的人生渴求和期待。这是他流亡时期内心深处一直在暗暗骚动着的一股情思。虽然20世纪30年代初期，也就是郭沫若流亡日本的中间一个时段，他基本上处在一种

^① 该诗创作时间的考订，见拙著《文化越境的行旅——郭沫若在日本二十年》之“附录”，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版。

安贫乐道于书斋的生存状态中，但 1935 年以后，郭沫若那种“长剑耿耿，倚乎天外”的人生渴求和激情变得愈加强烈，他在古代史与古文字研究之外的文学活动和文学写作日益增多。特别是在两个口号的论争中，郭沫若改变了此前相对疏离于国内文坛的姿态，热情地置身其中。这在郭沫若而言，实在是别有一种意义，因为从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的“方向转换”开始，他的文学活动即具有了鲜明的政治功利色彩，文学活动直接反映着他与现实关系的疏密程度。这样的变化似乎表明，郭沫若是想找回曾经有过的在文坛上、在北伐疆场上叱咤风云的感觉。

然而，这时的郭沫若还难以做出什么决断性的人生选择。与十余年前毅然埋葬了过往的青春的浪漫、埋葬了对幻美的追寻时的决绝和无所顾忌相比，郭沫若的人生境遇和人生经验都有了太大的变换，也有了许多的顾虑。

1937 年 5 月中旬，郭沫若接到郁达夫的来信。郁达夫在信中兴奋地告知：“南京来电，属我致书，谓委员长有所借重，乞速归。”同时写道：“中国情形，与十年前大不相同，我之甘为俗吏者，原因亦在此。将来若得再与同事，为国家谋一线生计，并设法招仿吾亦来聚首，则三十年前旧梦，或可重温。”^①与郁达夫的“喜不自胜”相比，郭沫若在读到这来封信时，却全没有“漫卷诗书喜欲狂”，“青春做伴好还乡”的兴奋，他的第一反应是“消息殊突然”。然后感喟困苦在日本的十年间，“母死兄逝，拖儿带女，殊觉茫茫”。一个月后，郭沫若给远在陕西三原的李德谟（一氓）写过一封信。信中写道：“二万八千里（原文如此——笔者注）的行程，我的肉体未能直接参加，我

^① 《郁达夫文集》第 9 卷，花城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468、469 页。“则三十年前旧梦”句，疑有误，似应为“十年前”。郭沫若在郁达夫前一年访问日本与之相见时，曾给他题诗道：“十年前事今犹昨，携手相期赴首阳。此夕重逢如梦寐，那堪国破又家亡。”

是十二分抱歉的。但我始终是和从前一样，记得前些年辰早就写过信给你，说我就骨化成灰，肉化成泥，都不会屈挠我的志气。”信中还就郁达夫来信已过一月，却再无后续消息，疑虑到政府方面“大约是并无诚意，只在使用心计吧”。然而信写好后，郭沫若犹豫再三，终没有发出，却留下一番感慨：“五年不通音闻。故人尚无恙，但已相形得自己之落后矣。”^①这种复杂而微妙的心绪一直持续到回国前夕，甚至在连船期都已经定下的时候，郭沫若仍然显出一丝游移不定。殷麀在《郭沫若归国秘记》中详细地描述了他这种矛盾的精神状态。实际上它反映出郭沫若对于前途，特别是政治前途有种不确定感。这既包含对于客观环境的不确定感，也有对于自己意欲所为的不确定感。

真正踏上归国的旅途，郭沫若便把一切游移不决抛在了身后。“四十六年余一死，鸿毛泰岱早安排”；“欣将残骨埋诸夏，哭吐精诚赋此诗”。他在《归国杂吟》中写下的这些诗句，清楚有力地表达出毁家纾国难的决心。

回到国内的当天，郭沫若就在孔德研究所向给他以建议的沈尹默表示，自己不准备埋头于纯学术的研究。在国难当头之际，置身于国内的抗战洪波涌浪之中，即使以郭沫若浪漫诗人的心性而言，他也不会仅仅充当一个学者的社会角色。战争就是政治，一场关乎全民族生死存亡的战争，不可避免地会把许许多多的人卷入到政治态势之中去。郭沫若更是如此，他的精神个性决定了这一点。

不过在开始的时候，郭沫若还是宁愿以纯粹文化人的方式抗战救国，如办《救亡日报》、考虑去南洋募捐。三厅组建的时候，他没有像当年在广东投身于军旅那样毫不犹豫。这之中既反映出郭沫若对于国共合作政治态势的某种判断，大概也有他从参加北伐到南昌起义失败后流亡日本之前那一段政治生活经验的影响。而且在郭沫若的精神

^① 据郭沫若纪念馆馆藏资料。

个性中，其实一直是存着几分昂首天外的自由不羁，所以他喜欢李白、陶渊明而不喜欢杜甫、韩愈。

然而，同样是在郭沫若的文化个性中一以贯之着的强烈的浪漫主义精神，构成了他极具个性色彩的思维方式、情感方式和行为方式，那就是强烈的理想主义精神与浓重的英雄主义情结。“五四”时期的郭沫若是作为一个诗人活跃在新文坛的，在他的文学活动和《女神》的创作中，都表达了一个基本的主题——毁坏与创造，即毁坏旧的社会秩序，创造新的理想世界；焚毁自我旧有的形骸，塑造至善至美的“人中的至人”。《女神》中最能震撼人心的诗歌意象是太阳、光明、大自然中无所不在的破坏力与创造力，是那个在宇宙间纵横驰骋、“开辟鸿荒的大我”。《女神》的世界中回荡的是理想主义颂歌，是英雄交响曲的激昂乐章。《女神》反映的也就是郭沫若的精神世界。

在郭沫若的精神世界中，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相互依存。理想主义表达的是关于人生、社会的思考，英雄主义表达的则是关于自我的思考。英雄主义以理想主义为寄托，为追求；理想主义靠英雄主义变为可能和现实。

从“五四”时期的文学活动开始，郭沫若的理想主义就不是写在纸上的空洞的呼唤，而是渗透在他的实践意识中；他的英雄主义也不是仅仅在文学作品里“夫子自道”的自我表现，同样渗透在他的实践意识中。曾经有一段时间，郭沫若迷恋过尼采。尼采说：“上帝死了！”郭沫若则说：“让我们从上帝贪懒偷闲的第七日上做起。”“五四”时期郭沫若是这样做的：他要做一个“开辟鸿荒”的“创造者”，开拓新诗歌，创造新文学，用现代思想阐扬中国古代文化传统，力图以“文艺复兴”式的努力从事现代思想启蒙，希望借此使中华民族获得“性灵的复活”。“五四”以后郭沫若还是这样做的：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投身北伐军旅，直接参加社会革命的实践。亡命日本时期他仍然是这样做的：从事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郭沫若并不单纯地把

研究的视野局限在古代史的学术范围之内，他是“出于对未来社会的待望，而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他要为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撰写续篇，填补关于东方古代社会、亚细亚生产方式研究的空白。

郭沫若在他的文化行旅中涉足了诸多领域，他的兴奋点总在不断转移，从文学创作到社会活动、政治活动，再到金文甲骨的研究、历史学研究。而且他总是选择去做具有开拓性、创造性的工作，选择进入需要面对挑战的人生领域进行探索。用他诗一般的语言来表达就是：“我创造尊严的山岳、宏伟的海洋，我创造日月星辰，我驰骋风云雷雨，我萃之虽仅限于我一身，放之则可泛滥乎宇宙。”而用他作为学者的自信则放言：“我们应该努力做出些杰作出来，供百年后的考据家考证。”

这就是郭沫若一直强调的创造意识、创造精神，它体现着郭沫若对人生的一种姿态——弄潮于时代，创造人生的姿态。

郭沫若的激情、浪漫中包含着浓重的英雄崇拜情结。他特别赞赏那种在多方面领域均有所成就的文艺复兴式的巨人，在他的眼中，孔子、歌德就是这样的“人中的至人”。他曾经这样描述孔子：“孔子这位大天才要说他是政治家，他也有他的‘大同’底主义；要说他是哲学家，他也有他 Pantheism（泛神论）底思想；要说他是教育家，他也有他的‘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底 Kinetisch（动态）的教育原则；要说他是科学家，他本是个博物学者，数理底通人；要说他是艺术家，他本是精通音乐的；要说他是文学家，他也有他简切精透的文学……他删诗书，笔削春秋，使我国古代底文化有个有系统的存在……”^①“我们所见的孔子，是兼有康德与歌德那样的伟大的天才，圆

^① 《三叶集》，上海亚东图书馆 1920 年版。

满的人格，永远有生命的巨人。”^①

从这样的描述中，我们看到的其实不仅仅是孔子其人，而是郭沫若的一种自我期许，是他为自己的人生设定的一个奋进理想，他也正是这样努力去做。郭沫若的英雄崇拜就包含在自我崇拜之中。如果说“五四”时期他的英雄主义还只是个性本位思想的表现，那么到了抗战时期，在经历过大革命的实践，在掌握了唯物主义史观的认识论、方法论之后，郭沫若把他的英雄主义建立在了人民本位的基点上。“个性不能消泯，亦不能偏废，但须立一标的，以定其趋向，为最大多数人谋最大幸福。”^②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有着这样一种人生追求的郭沫若，当然不会仅仅满足于以文章报国。所以，他没有接受蒋介石要他留在南京，给他一个相当的职务，只消作作文章的安排。他必定要接受更大的挑战，接受时代的选择，在民族解放战争的滚滚洪波之中弄潮，“把有限的个体生命融化进无限的民族生命里去”。

三

抗战时期无疑是郭沫若一生非常辉煌的一段时期。他不仅在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且作为抗战文化的一个领军人物在亦文亦政的道路上走得从容自如。

周恩来当年在重庆文化界纪念郭沫若从事创作二十五周年的活动中，对于他所走过的道路和他在新文化史上所发挥的作用，有一个十分精辟的评价。他说：“郭沫若创作生活二十五年，也就是新文化运

① 《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文艺论集》，上海光华书局 1925 年版。

② 《人乎，人乎，魂兮归来！——新版〈浮士德〉题辞》，《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 19 卷。